

列 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第 二 分 册

人 民 出 版 社

八

不作任何妥協嗎？

我們從上面引自法蘭克福出版的小冊子中的那段話里，已經看到“左派”何等堅決地提出“不作任何妥協”的口號。這些無疑是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並且願意作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竟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真理，這實在使人感到遺憾。請看看 1874 年恩格斯反駁三十三個布朗基派公社活動家的宣言時說的話吧；恩格斯同馬克思一樣，是少見的和極少見的著作家之一，這種著作家的每一巨著中的每一句話，都有極為深刻的內容。

恩格斯說：

“‘……我們所以是共產主義者，’——布朗基派公社活動家的宣言中說，——‘是因為我們要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間站停留，不作妥協，因為妥協只會推遲勝利到來的日子，延長奴隸制的時期。’

德國共產主義者所以是共產主義者，是因為他們通過一切不是由他們而是由歷史發展進程造成的中間站和妥協，清楚地看到並始終不懈地追求最後目的：消滅階級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制度。三十三個布朗基主義者所以是共產主義者，是因為他們以為，只要他們願意跳過各個中間站和各種妥協，那

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們确信如此——日內‘干起来’，政权落到他們手中，那末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們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

把自己的急躁当做理論上的論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見弗·恩格斯“布朗基派公社活动家的綱領”¹⁶，載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報紙《Volksstaat》^① 1874年第73号，引自“1871—1875年文集”俄譯本1919年彼得格勒版第52—53頁）

恩格斯在这篇論文中对瓦揚深致敬意，說瓦揚有“不容爭辯的功績”（瓦揚和盖得一样，在1914年8月背叛社会主义以前是国际社会主义最大的領袖）。但是，恩格斯对他的明显的錯誤却没有放过，而作了詳尽的分析。当然，在年紀很輕、沒有經驗的革命者看来，以及在甚至岁数很大、經驗很多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看来，好像“容許妥协”是异常“危險”的，是不可理解和不正确的。而許多詭辯家（那班十二分“有經驗的”政客）也正像兰斯柏利同志所提到的英国机会主义領袖那样，議論什么“既然布尔什維克可以作某种妥协，为什么我們不可以作任何妥协呢？”但是，在多次罢工（只拿階級斗争的这一种表現來說）中受到教育的无产者，对恩格斯所闡明的这一极深刻

① “人民国家报”。——編者注

的(哲学上的、历史上的、政治上的、心理学上的)真理通常都能很好地领会。每个无产者都经历过罢工,忍受过同可恨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所作的“妥协”,那就是,在自己的要求完全没有达到,或者只得到部分的满足时,也不得不去上工。每个无产者由于处在群众斗争和阶级对立急剧尖锐化的环境里,都看到了下列两种妥协之间的差别:一种是为客观条件(罢工者钱用完了,没有外界援助,陷于极端的饥饿和苦难)所迫而作的妥协,这种妥协丝毫不会使实行这种妥协的工人削弱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他们把一切推在客观原因上,而实际上却是贪图私利(工贼也实行“妥协”!),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讨好,屈服于资本家的威胁,有时是被资本家说服,有时是被他们的小恩小惠引诱,有时是被他们的甜言蜜语迷惑住了(这种叛徒的妥协,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英国工联领袖作得特别多,然而差不多所有其他各国的工人都见到过某种形式的类似现象)。

当然,有时也可以遇到异常困难复杂的个别情况,只有经过极大的努力,才能正确断定某种“妥协”的真实性质,——正像有些杀人案件那样,很难断定它们是完全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例如必要的自卫),或者是不可原谅的疏忽,或者甚至是经过精密布置的谋杀。当然,在政治上有时由于各阶级和各政党之间的(国内的和国际的)相互关系异常错综复杂,有许多情况判断起来,要比判断什

么是罢工中的合理“妥协”，什么是工贼、叛徒领袖等等的叛卖性“妥协”，更为困难。如果要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拟定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一般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为了能够分析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有自己的头脑。党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①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敏感，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

幼稚而毫无经验的人们，以为只要一般地承认容许妥协，就会把机会主义（我们正同它并且必须同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之间的任何界限都抹杀了。假使这些人还不懂得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动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相对的，那末除了对他们进行长期的训练、教育和启发，让他们取得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来帮助他们。重要的是在每个个别的或特殊的历史关头，要善于从实际政治问题中识别哪些问题表现出最主要的那种不可容

^① 每个阶级，即使是在最文明的国家里，即使它是最先进的阶级，并且由于当前的形势，它的一切精神力量得到最高度发挥，其中也总会有一些分子不动脑筋和不会动脑筋，而且只要阶级还存在，只要无阶级的社会还没有完全在自己的基础上加强、巩固和发展起来，就必然还会有这样一些分子。否则，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压迫群众的资本主义了。

許的、叛賣性的、體現着對革命階級有害的機會主義的妥協，並且要全力揭露這種妥協，同它進行鬥爭。在兩個同樣野蠻的強盜國家集團間進行帝國主義戰爭（1914—1918年）時，最主要的、基本的一種機會主義，就是社會沙文主義，即主張“保衛祖國”，在這樣一種戰爭中主張“保衛祖國”，實際上就等於保衛“本國”資產階級的強盜利益。在大战以後，保衛強盜式的“國際聯盟”；保衛同本國資產階級訂立的直接或間接的聯盟而反對革命無產階級和“蘇維埃”運動；保衛資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而反對“蘇維埃政權”，——所有這一切，都是那些不可容許的叛賣性妥協的最主要表現，這些妥協合在一起就成為危害革命無產階級及其事業的機會主義。

德國左派在法蘭克福出版的小冊子里寫道：“……凡是同其他政黨妥協……凡是實行機動和通融的政策，都應當十分堅決地拒絕。”

也真奇怪，這些左派既抱着這種見解，卻沒有堅決地斥責布爾什維主義！德國左派不會不知道在布爾什維主義全部歷史中，無論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後，都充滿着對其他政黨，其中包括對資產階級政黨實行機動、通融、妥協的事實！

為了推翻國際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戰爭，要比國家之間通常進行的最頑強的戰爭還要困難百倍，費時百倍，複雜百倍；進行這樣的戰爭而事先拒絕採用機動辦法，拒絕

利用敵人之間的利益矛盾（哪怕是暫時的矛盾），拒絕同各種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暫時的、不穩定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協，這豈不是可笑到了極點嗎？這豈不是正像我們想攀登一座崎嶇險阻、未經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預先拒絕有時要迂迴前進，有時要向后折轉，放棄已經選定的方向而試着向各種不同的方向走嗎？而那些如此缺乏覺悟、如此沒有經驗的人（如果這真是因為他們年輕，那還算好：上帝本來就讓青年在一定的時間內說這種蠢話的），居然還能得到荷蘭共產黨的某些黨員的支持（不管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公開的或隱蔽的，完全的或部分的支持，都是一樣）！！

在無產階級進行了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在一國內推翻了資產階級之後，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在很長時期內，依然要比資產階級弱一些，這只是因為資產階級有很廣泛的國際聯系，而且在這個推翻了資產階級的國家里，小商品生產者自發地、經常地使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恢復和再生。要戰勝比較強的敵人，只有盡最大的力量，同時必須極仔細、極留心、極謹慎、極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國資產階級之間以及各個國家內資產階級各集團或各派別之間的一切利益對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機會，哪怕是極小的機會，來獲得大量的同盟者，儘管這些同盟者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誰不懂得這

一点，誰就是絲毫不懂得馬克思主义，絲毫不懂得一般的現代科学社会主义。誰要是沒有在實踐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內和在相当复杂的各种政治情况中，证明他确实会运用这个真理，誰就还没有学会帮助革命階級去进行斗争，使全体劳动人类摆脱剝削者的压榨而获得解放。以上所說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过，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¹⁷；卡尔·考茨基、奥托·鮑威尔这类“享有专利权的”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錯誤和最大罪恶，就是他們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运用这一点。馬克思以前的俄国偉大的社会主义者尼·加·車尔尼雪夫斯基常說：“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¹⁸（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条笔直的主要街道，它的人行道清洁、寬广而平坦。）自車尔尼雪夫斯基以来，俄国革命家由于忽視或忘記了这个真理，遭受了无数的牺牲。我們无论如何要使左派共产党人以及西欧和美国忠于工人階級的革命家，不致于像落后的俄国人一样，付出那样昂貴的代价来領会这个真理。

在沙皇制度崩潰以前，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曾經多次利用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帮助，那就是說，同他們实行过多次实际的妥协；在1901—1902年間，在布尔什維主义还没有产生的时候，老“火星报”編輯部（当时参加

这个編輯部的有普列汉諾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和我)就同資產階級自由派政治領袖司徒卢威訂立过正式的政治联盟(時間固然不长),同时却善于不断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进行最无情的斗争,反对資產階級自由主义,反对工人运动内部有絲毫資產階級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現。布尔什維克一直繼續奉行这个政策。从1905年起,他們一貫坚持工农联盟,反对自由資產階級和沙皇制度,但是同时从来也不拒絕支持資產階級去反对沙皇制度(例如在第二級选举或复选时),从来也沒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对資產階級革命的农民党,即对“社会革命党人”作最不調和的斗争,揭露他們这班冒充社会主义者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1907年,在杜馬选举中,布尔什維克同“社会革命党人”訂立过短期的正式政治同盟。1903—1912年期间,我們不止一次地有好几年和孟什維克形式上同处在一个統一的社会民主党內,但是**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跟他們这些对无产阶级散布資產階級影响的人和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在大战期间,我們同“考茨基派”、左派孟什維克(馬尔托夫)和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諾夫、納坦松)作过某些妥协,同他們在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一起开过会,发表过共同宣言,但是我們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和削弱反对“考茨基派”、反对馬尔托夫和切尔諾夫之流的斗争(納坦松死于1919年;他当时非常靠攏我們,

几乎是一个跟我们意見一致的“革命共产主义者”民粹派)。正当十月革命的时候,我們同小資产阶级的农民訂立了一个非正式的、但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成功的)政治同盟,我們**全盘**接受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綱領**,而未作任何修改,也就是說,我們作了一次毫无疑义的妥协来向农民证明,我們并不想用优势压倒他們,而是願意同他們达成協議。同时,我們曾經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建議訂立(并且不久實現了)正式的政治同盟,請他們参加政府;但是在締結布列斯特和約以后,他們破坏了这个同盟,到1918年7月甚至举行武装暴动来反对我們,后来又进行武装斗争来反对我們。

因此,很明显,德国左派因为德国共产党中央抱着跟“独立党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即考茨基派)訂立同盟的想法,便加以攻击,在我們看来是极不严肃的,而且这些攻击证明“左派”显然是**錯誤**的。我們俄国也有过同德国謝德曼派类似的右派孟什維克(他們参加过克倫斯基政府)和反对右派孟什維克而同德国考茨基派类似的左派孟什維克(馬尔托夫)。1917年,我們明显地看到工人群众逐漸离开孟什維克而轉向布尔什維克:在1917年6月举行的全俄苏維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們总共只占13%的席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占大多数;在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旧历1917年10月25日)上,我們却占51%的席位。为什么德国工人这种完全同一性质的

从右向左的轉變趨勢，沒有立刻增加共產黨人的力量，却首先增加了中間政黨——“獨立”黨（雖然這個黨從來沒有過任何獨立的政見和任何獨立的政策，而只是動搖於謝德曼派和共產黨人之間）的力量呢？

很明显，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德國共產黨人採取了**錯誤**的策略，德國共產黨人必須大胆地老老實實地承認這個**錯誤**，並且學會糾正這個**錯誤**。這個**錯誤**就是否認有必要參加反動的資產階級議會和反動的工會，這個**錯誤**就是“左傾”幼稚病的無數表現；這種病症現在已經暴露到外面來，這就可以更好更快地把它治好，對於身體會更有益處。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部，顯然是不一致的：其中除掉那些已經證明不能了解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不能領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機會主義老領袖（如考茨基、希法亭、克里斯平、累德堡等看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以外，還有一個左翼，即無產階級一翼已經形成，並且正在非常迅速地發展着。該黨數十萬無產者黨員（該黨黨員共約 75 萬）正在離開謝德曼而迅速靠攏共產黨。這個無產階級翼已經在獨立黨人萊比錫代表大會（1919 年）上提議立即無條件地加入第三國際。如果害怕同這個黨的這一翼“妥協”，那真是可笑的。恰恰相反，共產黨人必須尋找而且**一定會找到**一種同他們妥協的適當形式，一方面可以便利和加速共產黨人同這一翼實現必要

的完全的溶合，一方面絲毫不妨碍共产党人对“独立党人”机会主义右翼进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斗争。要制定这样一个适当的妥协形式，大概是不容易的，然而只有騙子才会应許德国工人和德国共产党人一条“容易”致胜的道路。

如果“純粹的”无产階級沒有被那些由无产者到半无产者（一半依靠出卖劳动力謀生的人），由半无产者到小农（以及小手工业者和一般的小业主），由小农到中农等許多形形色色的中間阶层所包圍，如果无产階級本身內部沒有分成比較开展和比較不开展的阶层，沒有乡土、职业、有时甚至宗教等等的区分，那末資本主义便不成其为資本主义了。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階級的先鋒队，无产階級的觉悟部分，即共产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无产者的各种集团，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全部問題在于善于运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階級的觉悟性、革命性、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一般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順便应当指出：布尔什維克为了战胜孟什維克，不仅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就是在此以后也需要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策略，自然，我們所采取的这种策略，是足以促进、增进、巩固和加强布尔什維克而削弱孟什維克的。小資产階級民主派（包括孟什維克在內）必然要动摇于資产階級和无产階級之間，动摇于資产階級民主制度和苏維埃制度之間，动摇

于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之間，动搖于喜爱工人和畏惧无产阶级专政之間等等。共产党人的正确策略，应该是**利用**这种动搖，决不是忽视这种动搖；既然要利用这种动搖，那末就要对那些倾向于无产阶级的分子让步，当他们倾向的时候，实行让步，看他们倾向的程度，来决定让步的程度；同时要同那些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分子作斗争。由于运用了正确的策略，我国孟什维主义已经而且还在日益瓦解，顽固的机会主义领袖陷于孤立，优秀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优秀分子，都转入我们的阵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于那种“不作任何妥协，不实行任何机动”的操之过急的“决议”，只会有害于加强革命无产阶级影响和扩大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事业。

末了，德国“左派”十分固执地不承认凡尔赛和约，这也是他们的确定无疑的错误之一。这种见解像克·霍纳所表达的那样，表达得越“庄重”和“郑重”，越“坚决”和武断，结果就越笨拙。在现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仅仅唾弃那种荒谬绝伦的、甚至主张同德国资产阶级订立同盟对协约国作战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劳芬堡等），是不够的。应当认识到，不容许苏维埃德国（如果苏维埃德意志共和国不久就可以成立的话）在一定的时期内必须承认和服从凡尔赛和约的策略是根本错误的。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当谢德曼之流坐在政府里，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还没有被推倒，维也纳苏维埃革命还不是

絕對沒有可能去援助蘇維埃匈牙利的時候，在當時這樣的條件之下，“獨立黨人”提出簽訂凡爾賽和約的要求是正確的。“獨立黨人”當時實行機動和靈活是很不好的，因為他們多少替叛徒謝德曼之流分担了責任，多少離開了同謝德曼之流進行无情的（和十分冷靜的）階級戰爭的觀點，而滾到了“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觀點上。

然而，現在的局勢却顯然是這樣的：德國共產黨人不應當束縛自己的手脚，不應當許諾，共產主義一旦取得勝利，就一定要否定凡爾賽和約。這是愚蠢的。應該說：謝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干了一系列的叛賣勾當，阻礙了（部分地直接危害了）同蘇維埃俄國和蘇維埃匈牙利結成聯盟的事業。我們共產黨人則要採取一切辦法，去促成和準備這個聯盟，至於凡爾賽和約，我們完全沒有必要一定加以否定，而且立刻加以否定。能不能順利地否定這個和約，不僅決定於德國蘇維埃運動的勝利，而且決定於國際蘇維埃運動的勝利。謝德曼派和考茨基派阻礙了這種運動，而我們却要幫助這種運動。這就是問題的本質所在，這就是根本的差別所在。既然我們的階級敵人，剝削者，他們的走狗謝德曼派和考茨基派，放過了加強德國及國際蘇維埃運動，加強德國及國際蘇維埃革命的許多機會，那末，這種罪過就應該由他們去承擔。德國的蘇維埃革命會加強國際的蘇維埃運動，而國際蘇維埃運動則是反對凡爾賽和約、反對整個國際帝國主義的最強大的堡壘

(而且是唯一可靠、牢不可破、极其强大的国际堡垒)。一定要把摆脱凡尔赛和约的问题急不容缓地放在第一位，放在使其他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问题之上，这就是市僧的民族主义（这该由考茨基、希法亭、奥托·鲍威尔之流去提倡），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在欧洲任何一个大国，其中包括德国，推翻资产阶级将是国际革命的一大胜利，为了这种胜利，如果有必要，可以而且应当容忍凡尔赛和约存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既然俄国一国为了革命的利益能够忍受几个月布列斯特和约，那末苏维埃德国为了革命的利益，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的情况下，忍受为时更久的凡尔赛和约决不是不可能的。

法、英等帝国主义者做好圈套来陷害德国共产党人，向他们挑衅说：“你们说出来吧，你们不愿意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而左派共产党人不善于随机应变地对付诡计多端而且目前还比他们强大的敌人，不会回答敌人说：“现在我们要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却像小孩子一样，果然上了这个圈套。事先把自己的手足束缚起来，公开告诉那个目前武装得比我们好的敌人说，我们是不是要同他作战，什么时候要同他作战，这是愚蠢，而不是革命性。当应战显然对敌人有利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却去应战，那就是犯罪；革命阶级的政治家不善于实行“机动、通融、妥协”，以避免显然不利的战役，那就是毫无用处的人。

九

英国“左派”共产主义者

英国现在还没有共产党，但是在工人中间掀起了一种新的、广泛的、强大的、迅速增长的、前途确实无量的共产主义运动；有几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如“英国社会党”¹⁹、“社会主义工党”、“南方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工人社会主义联盟”²⁰）希望成立共产党，并且它们之间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在上述“工人社会主义联盟”的机关报“工人无畏舰周刊”（1920年2月21日，第6卷第48期）上刊载了该刊主编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所写的一篇文章：“向建立共产党的目标前进”。这篇文章叙述了上述四个组织谈判的经过，谈判的内容是，根据加入第三国际、承认用苏维埃制度代替议会制度以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等原则，来建立统一的共产党。原来，不能立刻成立统一的共产党的主要障碍之一，却是它们在是否参加议会和新的共产党是否加入旧的“工党”这两个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而这个“工党”大半是由工联组成的工会主义的、机会主义的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政党。“工人社会主义联盟”也跟“社会主义工党”^①一样，表示反对参加议

① 似乎“社会主义工党”反对加入“工党”，但不是全体党员都反对参加议会。

会选举，反对参加議會，反对加入“工党”，在这方面就和英国社会党全体黨員或多数黨員的意見不一致了，在它們看来英国社会党是英国“各共产主义政党中的右翼”（見西尔維婭·潘克赫斯特的上述文章第5頁）。

这样看来，根本分歧同德国是一样的，虽然分歧的表現形式（德国的表現形式同英国的比較起来，更加同“俄国的”相近）以及其他許多情况有很大差別。現在讓我們来考查一下“左派”的論据。

关于参加議會問題，西尔維婭·潘克赫斯特同志引证了同一期周刊上威·加拉赫（W. Gallacher）同志所写的一篇文章，加拉赫同志以格拉斯哥“苏格兰工人委员会”的名义写道：

“本委员会明确反对議會制度，而且得到了各种政治組織的左翼的支持。我們是苏格兰革命运动的代表，这个运动力求在生产中（在各个生产部門內）建立革命組織，并且以各地社会委员会为基础在全国建立共产党。长期以来我們同官方的議員們进行着爭吵。我們过去认为沒有必要向他們公开宣战，而他們也害怕向我們展开进攻。

然而这种状况不会长久繼續下去。我們正在全綫节节胜利。

苏格兰独立工党的黨員群众对于議會愈来愈起反感，几乎所有地方組織都贊成 Soviets（俄文苏維埃的英文譯音）或工人苏維埃。当然，这对于那些靠政治吃飯的（或以政治为职业的）先生來說，是极其严重的事情，因此他們用尽一切方法來說服他